# 双向赋能：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多案例扎根分析*

赵永丽[1]，左　停[1,2]

（1.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推进乡村振兴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数字游民作为摆脱传统工作模式，依托数字技术自由选择旅居地的新兴群体，对乡村生活充满向往，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选取5位数字游民作为案例样本点，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借助Nvivo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研究发现，多重压力叠加、体验与价值意义驱动、乡村资源优势、乡村发展需求、资源类互动、产业类互动、治理类互动、双向赋能、非良性互动9个主范畴是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重要因素，进而构建起“互动起因—互动过程—互动结果”的新型运作机制。最后，立足数字游民与乡村实现双向赋能的根本目标，剖析激发二者互动潜能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数字游民；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5)04-0075-10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数字游民”概念首次于1997年在《数字游牧》一书中提出，书中指出随着新技术对实践的渗透，人们可以借助智能技术摆脱传统工作模式，自由选择定居或者游牧方式，模糊家庭、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区别(Makimoto and Manners，1997)。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我国数字游民群体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姚建华，2024)。数字游民基于个体的生活、工作、情感压力，地理套利以降低生活成本原则，追求宜人的生活与生态环境，倾向选择乡村作为暂居点，造就了“互联网人才散落乡村”的景象。对于乡村而言，数字游民既契合乡村的市场需求，又掌握多重实用技能，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潜在力量。为吸引数字游民，诸多乡村创建了数字游民社区，例如浙江省安吉县的横山村DNA数字游民公社、云南省大理市的葱园村NCC数字游民共居共创社区等。此外，部分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数字游民发展的政策，例如浙江省丽水市于2024年12月18日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个由设区的市打造的全域性配套措施，意味着数字游民被正式纳入政策发展考量范畴。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通过整合双方资源优势，形成人才与乡村场域潜能激发效应。实践中，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案例，研究数字游民与不同类型乡村的互动模式，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第一，研究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缘由。周碧蕾(2024)提出乡村振兴是中国数字游民“液态流动”的政策背景，解佳等(2024)认为地理套利是支撑数字游民生活实践的重要经济条件，因此数字游民选择旅居乡村。王云龙(2024)主张数字游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038)。

作者简介：赵永丽，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建设。

通信作者：左停，男，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民在自由闲适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回归乡村。第二，研究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机制。王喆等(2023)提出数字游民社区建构了作为介于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异托邦，数字游民借助游民社区这类空间媒介能够构建认同、凸显可见性、激发志趣。陈拓等(2024)主张数字游民在乡村数字游民社区的支持下，形成“无组织性”的组织行动模式，这种行动模式通过“承诺”“工具”和“协议”共同形成，但在实践中面临着群体能动性不足的困境。第三，主张数字游民社区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中介。沙垚(2024)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提出乡村数字游民社区以县域发展的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创造乡村与青年碰撞的机会，以青年流动为方法，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难题。曾昕和沙垚(2024)主张数字游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具有数字属性和共创属性的数字游民社区成为线上线下的居间地带。

既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借鉴，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已有研究呈现两个特征: 第一，基于理论阐述，分析数字游民与乡村应然层面的互动，对实践中数字游民的生存压力和乡村发展需求的关注和回应不够。第二，已有研究更多基于数字游民社区(包括数字游民公社、数字游民基地等名称)实践，聚焦数字游民与社区间的互动。但实践中，数字游民对乡村的选择呈现多样性，仍然有较多数字游民选择散居于普通乡村。总之，已有研究忽略了实践的复杂性，即数字游民与不同类型的乡村如何互动，对数字游民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分析不够深入。

基于此，本研究以5位数字游民的实践为样板，采用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数字游民在乡村实践的原始资料，通过归纳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回应数字游民与不同类型的乡村何以实现双向赋能，以期为新发展阶段下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 二、研究设计

###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考察数字游民与乡村如何双向互动，本质上是一个聚焦过程的案例研究，因此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较为合适。多案例研究能够通过多案例不同维度间的比较分析，识别案例间的潜在关系并提高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应，进而得到较为普适和稳健的结论(黄建红等，2025)。多案例能够反映问题的复杂性，揭示差异化情境下问题及应对方式的多样性，获得比单案例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本研究选择了5位数字游民作为研究样本(见表1)。

**表1　选择样本的基本情况**

| 序号 | 名称 | 旅居地 | 时长 | 主要互动方式 | 目前状态 |
|---|---|---|---|---|---|
| 1 | 女儿国退休国王 | 贵州省丫他镇板万村 | 1年半 | 参加乡村义工活动、联动网民参与乡村建设、宣传村庄等 | 暂时离开 |
| 2 | 山里有个院 | 山西省马圪当乡下辖自然村 | 2年多 | 长期租赁并改造农房、宣传村庄等 | 持续留驻 |
| 3 | 豆沙的奇遇 | 浙江省DN余村数字游民公社 | 7个月 | 入住公社、参与村庄固定活动 | 离开 |
| 4 | 改名字中 | 云南省大理市某数字游民公社 | 1个月 | 入住公社、参与村庄固定活动 | 离开 |
| 5 | 深山阿成 | 湖南省铁坡镇某村 | 7个月 | 租赁农房、复耕复种撂荒地 | 持续留驻 |

研究样本选择依据：第一，5位数字游民旅居地为中国乡村，且与所在乡村有深入且较为持久的互动，参与乡村建设、参加乡村活动、与村民互动等。第二，5位数字游民具有显著差异，旅居于不同类型乡村，代表不同互动情况，支撑了多案例复制、对比和拓展的逻辑要求。第三，5位数字游民的数据可得性较高，其均在抖音、小红书平台详述了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心路历程、与乡村互动的经历等，其中3位数字游民旅居乡村的相关数据可通过官网获得，数据较为完备。

### （二）数据收集

从政府官网、乡村开发建设者、数字游民3个层面进行数据资料收集，以减少单一来源信息可能带来的偏差，保证数据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提高研究准确性和全面性。政府层面，数字游民作为一个新生概念，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其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前提，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对数字游民的总体期望。因此，重点查询各地区政府支持数字游民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新闻。乡村开发建设者层面，乡村开发建设者是数字游民与乡村联结的中介之一，典型代表为数字游民社区。其发展的数据资料可以作为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侧面写照，保证数据分析达到理论饱和。为此，综合数字游民旅居地的媒体资料、开发建设信息等，形成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环境分析。数字游民层面，其本身是依赖互联网工作的群体，发布短视频是获得收入的方式之一，相关短视频中蕴含个人真实感知、态度和独到见解，具有充分性、针对性、有效性等特征。对此，通过挖掘、分析数字游民的抖音视频，形成最终案例。

### （三）研究方法

在质性研究领域，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在经验资料研究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自下而上，从实际观察入手，在系统收集资料基础上寻找恰当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并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建构，最后上升到理论（陈向明，1999）。扎根理论分析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程序。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在此基础上，主轴式编码对初始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将具有相同逻辑的不同概念提炼为更高一级的范畴，选择性编码在主轴式编码基础上提炼核心范畴，并建立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系（张旺和白永秀，2022）。

## 三、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多案例编码与模型构建

###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基于原始资料，对其进行拆解、标签化和概念化，并根据概念的类别、性质等对其进行范畴化重组，为后续构建理论奠定基础。分别对5位数字游民的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分析。开放式编码结果见表2。

### （二）主轴式编码

**表2 多案例资料的开放式编码**

| 案例 | 原始资料 | 概念化 | 范畴化 |
|---|---|---|---|
| 女儿国退休国王 | ① 板万村与自己曾经生活的地区和经历差异性较大，拥有喀斯特地貌自然风光，民风淳朴、关系简单、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浓厚、工作环境简单 | 追求不一样的生活 | 享受地域特色 |
| | ② 上海很好，我融入得好像也不错，但每当深夜，从觥筹交错的大街拐入安静小巷时，我总还是想，这是一座消费资源过剩的城市，除了消费它，我又为它创造了什么呢 | 追求为外界创造价值 | 追求成就感 |
| | ③ 前两天板万的本地人和我说，他们体会到了自媒体的力量，因为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的人真的变多了，我真的感觉到我也充满了力量 | 自媒体为乡村吸引人流 | 为乡村吸引流量 |
| 山里有个院 | ① 今年二月份，我养了10年的狗狗去世了，事件是导火索，在此之前的三年里，我把这辈子要经历的磨难都经历了一遍，人心、信任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 | 长期遭受感情创伤 | 累积性情感挫折 |
| | ② 房东阿姨的厨艺很不错，我刚来的时候，阿姨做好吃的会盛上一碗给我送过来，现在不会了，喊我一声，我拿着碗就去了 | 邻里相互帮助 | 人际关系 |
| | ③ 2025年在所居住的自然村里因水管冻裂导致停水之后，她自发出资出力购买水管，并与村民一起上山安装水管，解决村庄停水问题 | 自发号召村民解决问题 | 自发参与公共事务 |
| 豆沙的奇遇 | ① 数字游民代表了一种对更高生活品质和自由度的追求。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中，最为核心的元素有两个，一个是地理位置自由，一个是时间自由 | 追求更高品质和更自由的生活 | 追求自由 |
| | ② 硬件设施和配套都非常棒，有大的办公区、健身房、台球桌、乒乓球桌、迷你KTV等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小图书馆，有共享厨房，也有园区配套的食堂 | 社区基础设施完善 | 基础设施完善 |
| | ③ 参与了余村云种田，在线上预约种植蔬菜，可以实地查看线上种植的西红柿，并且云种菜待田里作物长成时也会邮寄给主人。和公社小伙伴们参加了线下摘辣椒活动 | 参与线上和实地农地实践 | 参与乡村农业活动 |

续表2

| 案例 | 原始资料 | 概念化 | 范畴化 |
| --- | --- | --- | --- |
| 改名字中 | ①老人排挤新人，尤其是几个居住时间长的女性排挤新入住的女性居民，有形无形中排挤 | 社会关系不合 | 群体排斥 |
| | ②主理人非常势利眼，只和在他看来有价值的人喜笑颜开，没有价值的即使是社区居民也不稀罕认识你 | 社区主理人的功利性交往行为 | 利性交往 |
| | ③住宿费用比周边村子大概贵一半，以为贵出来的钱会得到相应的配置 | 社区场景溢价高 | 场景溢价 |
| 深山阿成 | ①之前去城里打工十几年，但是换来换去都是在做最底层的苦力工作，每个月挣的工资除去租房和生活费，也所剩无几，因为厌倦了起床就得去上班，下班就睡觉的日子，还有那永远都加不完的班 | 厌倦底层高强度和低收入的劳动 | 高强度工作 |
| | ②接活给大山种植杂草，提供劳动力，一天180元工资 | 提供劳动力 | 劳务服务 |
| | ③村里房子一般都是单家独栋，每户距离都很远，村上房子基本是闲置的 | 有许多闲置农房 | 闲置资源多 |

注：限于篇幅，仅显示部分开放式编码。

基于5个案例的开放式编码，形成31个副范畴，在此基础上，根据现象条件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将范畴连接起来，形成具有逻辑性的理论框架。本研究目的是分析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按照互动过程呈现的不同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情境约束、行动策略和结果等，最终提炼出多重压力叠加、体验与价值意义驱动、乡村资源优势、乡村发展需求、资源类互动、产业类互动、治理类互动、双向赋能、非良性互动9个主范畴，其对应的副范畴及其内涵见表3。

### （三）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表3　主轴式编码结果

| 主范畴 | 副范畴 | 范畴内涵 |
| --- | --- | --- |
| 多重压力叠加 | 高强度工作 | 个体在工作中投入超于常规的体力、脑力和情感资源 |
| | 累积性情感挫折 | 短时间内遭受多次或来自不同层面的情感伤害 |
| 体验与价值意义驱动 | 追求成就感 | 渴望通过努力达成目标，获得周围人认可，从中体验到价值感 |
| | 追求自由的生活 | 追求时间自由、地理位置自由、生活方式自由等 |
| 乡村资源优势 | 生活成本低 | 个体在乡村维持居住、餐饮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支出水平较低 |
| | 地域特色鲜明 | 乡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地理、自然环境等独特属性 |
| | 环境优美 | 乡村景观优美，具有观赏性 |
| | 基础设施完善 | 乡村为满足居民生产生活而建设的公共服务系统达到健全、适配的状态 |
| | 生活随性 | 乡村社会特有的弱化规训约束、强调自主自在的生活特质 |
| 乡村发展需求 | 盘活闲置资源 | 对乡村撂荒地、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进行激活和再利用 |
| | 乡村文旅发展 | 以乡村为空间，以乡村资源为核心，满足游客体验乡村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增值 |
| | 乡村吸引人流 | 乡村期望吸引外部人口，包括短期停留与长期留驻群体，并形成持续互动 |
| | 乡村业态更新 | 乡村依赖外部人口或新契机，实现产业形态、经营模式的重构与创新 |
| 资源类互动 | 乡村农业活动 | 数字游民基于乡村土地资源开展线上线下种植养殖活动 |
| | 房屋租赁 | 农户以契约约定将房屋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转交给数字游民，数字游民支付租金 |
| | 房屋改造 | 数字游民对租赁的农房，进行设计调整、设施更新和功能重构 |
| | 短视频拍摄 | 数字游民基于乡村生产生活，通过短视频进行创作活动 |
| 产业类互动 | 劳务服务 | 数字游民与村民通过提供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以满足对方需求的服务 |
| | 餐饮服务 | 提供食品加工或供应的服务 |
| | 体验经济 | 通过营造具有参与感的活动场景，吸引消费者前来体验 |
| | 二手商品交易 | 对已经使用过的商品，通过买卖实现所有权转移，推动物品从闲置到再利用 |

续表3

| 主范畴 | 副范畴 | 范畴内涵 |
|---|---|---|
| 治理类互动 | 参与公共事务 | 数字游民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公共事务 |
| | 人际关系联结 | 数字游民与村民通过情感互动形成舒适的关联 |
| | 自发性社群活动 | 由个体围绕共同目标，自主策划和组织的集体性社群活动 |
| 双向赋能 | 为乡村吸引流量 | 数字游民通过短视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提高社会认知度 |
| | 获得成就感 | 数字游民在与乡村互动过程中，价值得以实现，由此产生积极心理感受 |
| | 身心愉悦 | 数字游民在互动中产生的生理健康、舒适状态，心理获得满足、轻松、快乐等情绪 |
| 非良性互动 | 基础设施不完善 | 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未能满足数字游民基本需求 |
| | 场景溢价与功利性交往 | 某些服务和产品的定价显著高于其基础功能成本，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以利益为导向，忽视情感联结和价值共鸣 |
| | 经济压力 | 数字游民难以实现收入增长与乡村难以提供就业机会的矛盾 |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式编码基础上，经过系统整合，形成一个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构建逻辑网络，主要任务是聚焦，避免多理论分支过多。本研究通过对主范畴的分析，以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起因、互动机制和互动结果为核心范畴，用图形或文字框架展示核心范畴与其他要素的互动(见图1)。其中，数字游民的多重压力叠加、体验与价值意义驱动、乡村资源优势以及乡村发展需求是二者互动的起因。数字游民与乡村围绕乡村资源、乡村产业和乡村治理展开互动，最终产生双向赋能和非良性互动两种互动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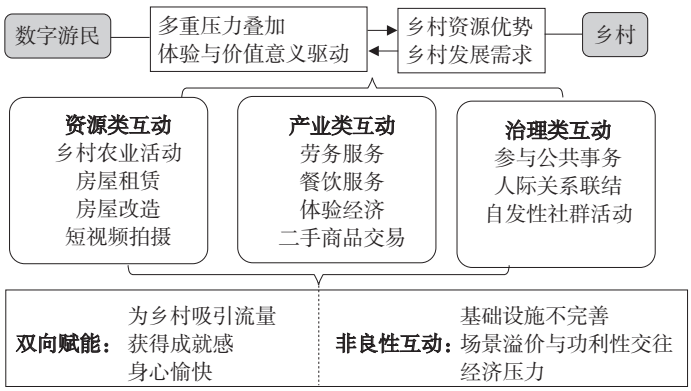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机制模型构建思路

## 四、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起因识别

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起因识别受到多重因素综合作用，既包括数字游民的压力和需求驱动，也包括乡村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的影响。

### （一）数字游民迁徙乡村：多重压力与意义感驱动

数字游民选择到乡村旅居受到自身多重压力和追求体验感、意义感的驱动。

1. 多重压力叠加：数字游民迁徙的外在压力

在多重压力叠加下，个体感知到当前压力超过了自身承受范围，逃离与迁徙成为有效的避险策略(马川，2024)。一方面，个体面临的各种问题通常与工作压力密切相关。在成为数字游民之前，个体面临着传统科层管理中的考勤制度和物理空间绑定机制的限制，即固定时间之内必须在物理空间内，以相对固定的身体姿态从事脑力或体力工作，导致个体面临着视觉疲劳、腰肌劳损以及一系列职业

病。而且受限于职场科层管理的上下级权力关系，下级需最大限度满足上级提出的各种要求。这种服从由工作时间延伸到生活时间，使得下级不得不加班，增加了身体损耗。如数字游民“山里有个院”曾因高强度工作而生病。在考勤制度和物理空间绑定机制下，个体易患通勤倦怠综合征和定时定点打卡焦虑症，而这与数字时代弹性工作需求相矛盾。另一方面，累积性情感挫折使数字游民期望更换生活空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交往中，个体的基本诉求是自我保护，当个体遭遇社交场域的情感创伤时，会激活心理防御系统，逐渐从集体和家庭生活中脱离出来，通过空间迁徙实现社会关系的物理性断裂。例如数字游民“山里有个院”受到亲情、友情、爱情的多重情感挫折后，选择到山西一个陌生农村重构生活秩序。

2.追求体验和价值意义：数字游民迁徙的内在动力

追求体验和价值意义是个体深层的精神诉求。一方面，个体追求体验意义。体验是个体拒绝模式化生存，通过切换生活场景从而拓宽认知边界。现实中，个体被束缚在工作框架内，生活受到科层制工作中时间和空间的规训，结婚、生子等重要事件依附于请假。从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结果来看，数字游民不再局限于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及足够高的收入等，而是通过旅居满足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体追求价值意义。价值意义是个体在行动中找到与信念的契合点，在贡献中获得精神满足，实现个体存在的自我确认。在都市空间中，个体价值被弱化，主体价值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无法得到具象化反馈和确认。相反，在乡村空间中，慢节奏的生活和简单的人际关系使个体聚焦内在需求，将为个体提供小而确定的价值锚点。“女儿国退休国王”的观点印证了数字游民对价值意义的追寻。她认为上海是一个消费资源饱和的城市，很难创造出新价值，而在板万村，自媒体为乡村带来了关注度，吸引了大量游客，她也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

**（二）乡村吸纳数字游民：资源优势与自身发展需求**

乡村地理环境、生活状态等资源优势对数字游民具有外在吸引力，而乡村之所以接纳数字游民，也是因其自身的发展需求使然。

1.资源优势：乡村对数字游民的外在引力

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态之一，具有以农业生产为主导、自然景观比例较高、人口密度较低、社会结构较为传统且稳定等特征。首先，乡村生活成本较低。与城市相比，乡村土地成本低于城市，农产品流通环节较少，日常消费压力小，数字游民基于地理套利原则选择旅居乡村，利用城乡成本差异，节省经济资源。其次，乡村地域特色鲜明。不同地域乡村呈现出不同的自然风貌，部分乡村承载着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吸引在城市生活的数字游民前来旅居。最后，部分乡村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先发示范型乡村前期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成本，经过多轮实验、反复更正，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数字游民的制度、规则和固定流程，以适用于高人流密度场景，例如浙江省余村搭建了标准化数字游民社区，硬件设施比较完善，吸引数字游民前来乡村旅居。

2.发展需求：乡村吸纳数字游民的内在动因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成为乡村发展的绩效考核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从中央推动到基层落实，是政策制定、执行、激励和监督等多项权力在不同层级主体之间分配的过程。在压力型体制的效用目标驱动下，各级政府基于问责压力、外部杠杆比较压力、向上表决心和对下级高效动员等原因，倾向于向乡村传导压力，推动乡村为实现绩效目标做出努力（徐国冲和黄丽妹，2024）。示范和亮点是政府为推进乡村振兴打造的象征符号，村级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在绩效考核驱动下卷入乡村振兴注意力和政策支持争夺中，面临发展乡村、打造符合乡村特色的亮点工程难题。而农民的流动致使农房、土地等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乡村活力亟待激发。吸引优秀青年，以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实现乡村业态更新、扩大乡村影响力，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乡村对数字游民旅居乡村持接纳态度。

## 五、数字游民与乡村的适应性重构

在数字游民与乡村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情境下，二者围绕乡村资源、乡村产业和乡村治理开展互动。

### （一）资源类互动：互动共生的基础保障

资源类互动是乡村向数字游民开放土地、农房、自然景观等资源的利用权限，数字游民以恢复、改造、提升等形式激发乡村资源活力，是产业类和治理类互动展开的基础。

资源类互动一方面以租赁农房、土地等规范型资源置换的形式呈现。以制度信任为核心的规范型资源置换是陌生人互动的基本准则，能维系公平正义，对双方合作发挥保障和促进作用。规范型资源置换是基于明确规则、固定流程和可量化目标，由数字游民和乡村开展的标准化合作，资源置换以房屋、土地、资金、政策等显性资源为主，具有降低成本、解决即时需求、权责明晰、低风险、灵活性低等特点。例如，5位数字游民以合同或明码标价的方式租赁农房或数字游民社区，“豆沙的奇遇”和“深山阿成”还开展了农作物种植等活动。另一方面以房屋改造、短视频拍摄等探索型资源整合的形式呈现。探索型资源整合是基于未知情境、开放试验和容错环境，由数字游民和乡村开展的试探性合作，具有创新性、高风险、高回报、回报周期长等特点，以探索潜在机会、容忍资源短期损耗实现资源创新发展。互动过程中，数字游民进行资源整合，以小范围、轻度资源拼凑避免了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对资本投入的重度依赖及系统性开发风险。例如，山西省灵岩寺村尚未进行房屋统一规划，数字游民可以获得自由探索空间，“山里有个院”在灵岩寺村自由改造房屋。此外，“女儿国退休国王”“山里有个院”“豆沙的奇遇”“深山阿成”利用个人抖音账号记录乡村日常生产生活，所在乡村对短视频创作给予支持，既实现了数字游民的短视频营利，也为乡村带来了流量曝光。

### （二）产业类互动：价值共创的核心动力

产业类互动是数字游民与乡村在经济生产领域开展的价值共创，是双方从资源层面向产业链条的延伸，核心在于创造经济价值。第一，劳务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支撑。乡村面临部分农民就业机会不足及部分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劳动力的难题。数字游民一方面通过雇佣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如“山里有个院”在改造房屋过程中雇佣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乡村注入优质在地劳动力资源，如“深山阿成”参与为深山种植杂草的劳务活动。第二，餐饮服务加强基本生活保障。乡村餐饮服务的可持续运营依赖稳定的客源，数字游民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旅居于乡村特别是数字游民社区的数字游民具有日常餐饮消费和社交聚餐需求，带动乡村餐饮业发展。第三，体验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体验经济是依靠用户体验需求打造消费热点，以体验为中心的新经济形式。数字游民在资源类互动中通过短视频记录生活，吸引网友前来乡村体验农家生活，带动了乡村发展。第四，二手商品交易提升闲置物品经济价值。农村老物件承载着集体记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老物件将逐步减少，稀缺性叠加历史感，使老物件吸引特定消费群体。数字游民在乡村旅居中接触到老物件，产生了购买欲望，农民通过出售老物件获得直接收入。

### （三）治理类互动：深度融合的联结纽带

治理类互动是在乡村治理或者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数字游民与村干部、农民之间通过协商、参与等方式，围绕资源调配、问题解决、人际联动等目标开展的交互行为，核心是通过协同配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组织的有序运行。第一，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类互动的效能根基。农村公共事务是超出乡村个体和家庭的范围、对农民产生影响的事务，需要在乡村层面达成治理的共识（王晓毅，2016）。数字游民和乡村基于相互信任和共同性目标，跨越组织边界，打破各自资源壁垒，以有意识行为协同合作，通过整合资源，产生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效能。互动过程中，数字游民注入劳动力、资金、情感等，乡村提供在地劳动力资源、制度信任和政策支持等，实现资源双向互动和能力互

补，进而创造新价值。例如“女儿国退休国王”2023年起参加支教团、在乡村做义工，2024年4月利用个人抖音账号记录板万村生活并发起“上山去”72小时义工活动，为乡村招募外来人才，无偿参与乡村建设。第二，人际关系联结是治理类互动的信任纽带。乡村治理场域中地缘、血缘和事缘的实践情境，是建立不同主体人际信任、凝聚协同治理合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前提（朱金涛和孙迎联，2025）。数字游民旅居乡村后，通过与村民共同参与、处理具体事务而形成联结状态。数字游民与农民个体在商品交易、日常交谈及人情往来中建立密切关系，例如“山里有个院”在房东家搭伙就餐，在日常相处中缓解了房东夫妇的孤独感。在乡村组织暂未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数字游民亦承担起组织动员角色，带动村民完善村庄基础设施。例如“山里有个院”在所居住的自然村因水管冻裂导致停水之后，自发出资购买水管并与村民一起上山安装，解决村庄停水问题，由此促进村民对她的信任。第三，自发社群活动激活治理类互动的基层活力。自发社群活动打破行政指令自上而下地单向度传递，基于数字游民和村民共同需求实现主动集结，通过高频次和多场景互动，促进乡村治理。居住于数字游民社区的数字游民常发起社群活动，增强了团体凝聚力。

## 六、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结果

在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中，既产生联动共生、双向赋能的积极结果，也存在较大的优化升级提升空间。

### （一）双向赋能：联动共生的积极结果

数字游民和乡村资源互赖是双向赋能的基础。数字游民与乡村基于价值交换共生机制进行互动。数字游民开发乡村资源，在乡村实现工作、生活和旅行合而为一，利用乡村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创造空间缓冲自身压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乡村内化外来资源，吸引、支持数字游民在乡村生活和工作，利用数字游民个人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流量效益促进乡村发展。数字游民和乡村共同构建高效运作的资源转化器，促进数字游民个体成长及乡村多元化发展，实现双向价值增值。

### （二）非良性互动：优化升级的提升空间

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一，部分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部分乡村在供暖、餐饮、物流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数字游民希望通过被“物化”的仪式展示和发展自我，“男朋友送的草莓蛋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初雪的第一顿火锅”等被当成社交需要的符号（赵平等，2022）。数字游民为适应乡村被迫改变原有生活方式，会削弱数字游民旅居乡村的幸福感。第二，数字游民社区场景溢价较高，存在群体排斥和功利性交往等问题。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乡村先行建立了一批数字游民社区，但是生活成本高于周边乡村，影响数字游民体验感。而且由于社区的群体生活处于主理人的统筹管理下，存在群体内部排斥、主理人趋炎附势、功利性交往等问题。第三，数字游民难以实现收入增长与乡村难以提供就业机会的矛盾。数字游民旅居前通常会准备一笔启动资金，旅居过程中，若乡村无法提供优质就业机会，数字游民自身难以依靠互联网实现增收，其将容易放弃旅居生活。数字游民“豆沙的奇遇”谈到很多数字游民朋友半途而废，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比较大。

##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结论

通过对以上样本案例的编码分析，构建了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起因—互动过程—互动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互动起因方面，数字游民迁徙到乡村受到多重外在压力、追求体验和价值意义内在动力的双重驱动；乡村吸纳数字游民缘起于乡村资源优势吸引数字游民，以及乡村内部具有发展的需求。在互动过程方面，资源类互动是互动共生的基础保障，其以租赁农房、土地等规范资源置换及房屋改造、

短视频拍摄等探索型资源整合的形式呈现；产业类互动是价值共创的核心动力，其中劳务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支撑，餐饮服务加强基本生活保障，体验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手商品交易提升闲置物品经济价值；治理类互动是深度融合的联结纽带，其中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类互动的效能根基，人际关系联结是治理类互动的信任纽带，自发社群活动是激活治理类互动的基层活力。互动结果方面，既产生了双向赋能、联动共生的积极结果，也存在着优化升级的提升空间。

### （二）政策建议

#### 1.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满足数字游民需求

首先，乡村要完善生活场景基础设施，满足数字游民生存需求。积极推进集中供水工程，建立取水、输送水、水处理和管理系统，特别保障寒冷地区冬天供水、地势高处稳定供水。加强村级寄递物流服务建设，实现快递进村，满足数字游民网上购物需求。县域范围内实施乡村公路提升行动，改善城乡融合的交通环境。提高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推动改厕和污水治理，消除乡村黑臭水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其次，乡村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满足数字游民工作需求。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游民工作的基础，为确保数字游民正常工作，县域范围给予资金支持，提高乡村宽带网络连通率。通过与互联网公司利益互换、长期合作等方式降低互联网使用费，鼓励村民接通互联网，保证数字游民数据传输正常进行。最后，乡村要完善商业场景基础设施，满足数字游民仪式感需求。要逐渐引进热门商业店铺和商业模式，积极模仿、复刻、创新运营模式和运营产品，满足数字游民的仪式感需求。乡村可以设计“漫步道”或者“风情街”，规划文化展演空间，策划商业活动，使数字游民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富有仪式感的生活体验。

#### 2.构建共创空间，充分释放数字游民价值

乡村需要构建与数字游民的共创空间，为数字游民提供共同创新、价值创造平台，提高数字游民的参与感。乡村给予数字游民发展空间，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办公场地和市场信息等资源，支持其在乡村拍摄抖音视频、从事电商直播等，营造助力数字游民发展的人文环境。乡村鼓励数字游民与农民自由合作，例如租赁房屋、买卖商品、技能交换、情感交流，并依据合作情况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村集体为数字游民建立荣誉体系，颁发“云村民”证书，健全数字游民权益保障机制，增强其对乡村的归属感。农村基层党组织完善乡村组织结构和议事制度，吸纳数字游民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聘请数字游民为村民传授技能，例如培训村民运营视频账号、经营管理资产等。

#### 3.创新就业机制，稳固数字游民发展根基

乡村要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为数字游民提供专项无息贷款，支持其在村创业或参与乡村建设项目。乡村为数字游民提供住房补贴、日用品购置补贴、生活费支持，减轻数字游民的生活负担。乡村要结合特色资源禀赋和数字游民专业技能，创设乡村短视频制作、乡村数字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手工艺品设计等岗位。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和专业技能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举办创业就业沙龙等活动，促进数字游民提升自我。还可建立人才信息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发布数字游民求职信息和乡村企业招聘信息，更新各类资讯，实现信息共享。

### 参考文献

[1] 姚建华. 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J]. 人民论坛, 2024(7): 86-89.

[2] 周碧蕾. 本土数字游民: 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J]. 求索, 2024(6): 62-71.

[3] 解佳, 阳棪昌, 何轩, 等. 液态生活: 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J]. 旅游科学, 2024, 38(5): 41-56.

[4] 王云龙. 从“游走”到“入乡”: 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与重塑——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6): 68-77+67.

[5] 王喆, 邓雅萱, 杜馥琪. 数字游民的异托邦社会空间生产实践——以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例[J]. 未来传播, 2023, 30(5): 42-51.

[6] 陈拓, 李立杰, 王珏. 从“游”到“民”: DNA数字游民公社的组织力量与乡村嵌入[J]. 传媒观察, 2024(8): 75-86.

[7] 沙垚. 流动作为方法: 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J]. 新闻界, 2024(4): 28-35+47.

[8] 曾昕, 沙垚. 虚拟与现实的居间地带: 数字游牧青年的新型社会化实践[J]. 新闻与写作, 2024(12): 16-25.

[9] 黄建红, 刘世杰. 互促共振: “内外链接”如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世界农业, 2025(1): 56-66.

[10]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73.

[11] 张旺, 白永秀.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J]. 中国软科学, 2022(1): 132-146.

[12] 马川.“全职儿女”现象: 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2): 86-93.

[13] 徐国冲, 黄丽妹. 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绩效评估的运作机理: 一个类型学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8(6): 68-80.

[14] 王晓毅.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5): 54-60.

[15] 朱金涛, 孙迎联. 数字乡村治理“虚化”问题的深层肇因与化解机制——基于“技术-主体-信任”的分析框架[J]. 新疆社会科学, 2025(3): 152-160.

[16] 赵平, 冯惠芳. 青年“伪仪式感”的本质透视、主要诱因及祛“伪”之策[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11): 96-102.

[17] Makimoto T, Manners D. Digital nomad[M].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97.

（责任编辑：肖舒苑）

# Mutual Empowerment: A Multi-case Rooted Analysis of Digital Nomads' Interact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ZHAO Yongli[1], ZUO Ting[1, 2]

(1.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common cause for the whole society. Digital nomads, as a new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free from the traditional work mode and free to choose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by relying on digital technology, are full of desire for rural life and are important talent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ive digital nomads are selected as case sample poi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nomads and the countryside is studied by applying the rooted theory analysis method and conducting multi-case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Nvivo. It is found that the nine main categories of multiple pressures, experience and value- driven meaning, countryside resource advantages,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demands, resource-based interaction, industry-based interaction, governance-based interaction, two-way empowerment, and non-beneficial interaction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nomads and the countryside. Then, a new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cause-interaction process-interaction result" is constructed. Finall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wo-way empowerment between digital nomads and the countryside, the specific path to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digital nomads; rural revitalization; mutual empowerment; grounded theory